

20^{世纪} 中国古典文学 学科通志

第1卷

编写指导 徐公持
主 编 刘敬圻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04AZW003)

20世纪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1卷

顾问 傅璇琮 徐公持

特聘编写指导 徐公持

主编 刘敬圻

副主编 张安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 1 卷 / 刘敬圻主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328-6299-3

I. ①2…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概况—20 世纪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469 号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一卷

主编 刘敬圻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3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22.375 印张

字 数: 5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6299-3

定 价: 6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888

前言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 世纪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在此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实现了由在民族生存危机中挣扎向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转换。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在 20 世纪之中发生的变化,是整个国家民族变化发展的一个小小侧面,也是大局面、大趋势的一种映照。在短短百年中,古典文学学科基本完成了从古典式向现代性的过渡,取得了体质上的根本转变。在进步的过程中,也兴起过不少波澜,发生过许多曲折,甚至也有一时的倒退。在这个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坎坷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件,磨砺出一批杰出成果和学术经典,涌现了一些优秀学者和学术大师。这是一株千年古树结出的果实,更是时代新潮中萌发出的新芽。它不能不令我们深感惊奇、振奋和自豪,值得后来人花大力气去发掘它、了解它、研究它。

百年学科有待深入认识和总结,以利于今后学科的健康再造,也利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成长发展。不少学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已经从各个角度着手研究百年学科,推出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有些百年学科中的问题,已经得到广泛关注,甚至成为不少学者研究的重大兴趣点。《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以下简称《通志》)经多年酝酿筹备,于 2004 年获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自兹以降,在项目参加者共同努力下,迭经六年光阴,终于基本完成。

一、《通志》的性质和特点

《通志》的对象是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我们所要阐释的主要内容是：学科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发生的重大趋势，所出现的代表性学者，以及所产生的代表性著作。事件、趋势、学者、著作，是《通志》对象中的四大类内容和义项，它们决定了《通志》具有学术史的基本性质。

不过，具有了上述四大类内容，并不等于就是学术史。《通志》的性质，不能以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的体制来衡量，因为它具有一些特别的编写目标和考量。《通志》所重点关注的，是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史上的基本事实。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清理和认定学科史的事实，而不是去论证和总结学科史的发展规律。目的只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使相关“史实”呈现更加清晰的面貌。而有关百年学科史发展的内在因果和规律问题，不是《通志》所要解决的直接课题。我们并不刻意回避关于本质和规律的总结，但那是更加艰巨的目标，有待于广大同好长期深入多方面研究，方能有望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抉择，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百年学科研究的现状与基础甚是薄弱。20 世纪刚过去不久，本学科在百年中所走过的道路空前曲折、空前坎坷，相关史料空前繁富、空前复杂，而相应的学科史研究工作起步较晚。近年来虽有部分学者投入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对 20 世纪学科基础资料的清理和史实的认定，还留下许多空间。我们对百年中的有些时期（如“五四”时期、50 年代、60 年代、八九十年代）的学科情况了解稍多，而对另一些历史时期的学科状况，就不甚清楚，甚至很不清楚。即使在了解稍多的时段内，我们已有的史实清理工作也做得远不是那么全面完善。例如“五四”时期，学界对于那些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的学科现象比较关注，而一些被认为观念或方法比较“陈旧”的、以及远离新潮文化的本学科成果，就少有人

关注,事实上我们对那一时段学科状况的已有认知尚存在着片面性。在其他时期,由于观念上的以及思维方式上的偏颇,更存在不少被忽略的学科“盲点”。总体上看,以上所说四大方面的百年学科基本史实,远没有得到较为系统的整理。基本“史实”尚不够清晰,欲作更进一步的系统性研究和理论性阐述,谈何容易?鉴于此,我们觉得应当把史实的辨认,真相的恢复,面貌的廓清,脉络的梳理,作为当下亟待要做的事情。这虽然是基础性的工作,却涉及学科史研究的发展前景,不能不予充分的重视。二是我们从自身条件出发所作出的工作重心选择。做好资料清理和史实认定工作,努力记述百年学术真相,主要靠的是求实的态度和扎实的功夫。我们编写者在学科史领域的原本学养和能力有限,尤其是对百年学科的理论性、全局性把握尚不成熟。我们都是近年才先后开始关注学科百年问题,所以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全新课题。还要考虑到这是一部集体著作。在如此条件下面对这样的工作,切忌不顾实际、好高骛远。与其一入手就企图去做高度理论性概括,不如脚踏实地先做力所能及的史实整理工作,更加有效。从这一角度言,《通志》实际上选取了一种既符合学科现状需要的、又切合编写者能力实际的难易适度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方式。要之,我们对建设学科史大厦充满期待,但我们愿意先从清理地基的工作做起。

二、《通志》的体裁和写法

出于以上考量,《通志》的框架设计中不设以大统小的章节,而是采取百题的结构法。每个专题只是针对一个或一方面的具体问题而设,每个专题不外乎清理和认定事件、趋势、学者、著作等相关史实,每题都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专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线状的统领关系,而是块状结构,所以相对简单。专题大体上以时代先后排列,体现一种时序上的关联照应,集合百题所述,能够基本覆盖百年学科史的各个领域。所以,全书是众多

专题性篇章的有序集合体。

与内容重心相对应,《通志》在写法上也有自己的独特选择。由于以“真相记述”为主,所以我们强调,撰写《通志》篇章,主要让读者知道相关问题的基本事实,包括历史上对此问题曾经有过哪些重要的评论。我们不提倡执笔者对于所记述的问题发挥太多的一己之见,我们要求少作标新立异之举,宁愿克制或者牺牲一些学术个性,也要向“翔实”靠近,尽量做到通过对基本事实和论点的切实记述和介绍,让读者自己得出对某个问题的结论。我们还要强调本书应当具备一定的工具性质,工具的个性色彩必定是比较淡薄的,但它或许更能够赋予一部学术著作以比较长久的生命力。

三、《通志》的风格

性质和写法决定风格面貌。《通志》的主旨既然是“认定和记述史实”,在风格上的要求则可以归纳为“翔实”二字。所谓“翔实”,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真实、确实、切实。我们所说“认定和记述史实”中就包含了求真、求实的态度和过程。“认定”要以认真精细的辨别工作为前提,是对相关材料作全面仔细鉴别之后所作出的科学认定。有些史实扑朔迷离,错综复杂,一时不能“认定”,不妨暂时不定,存疑可也。存疑处理,是“不定之定”,也符合翔实的要求。第二,“翔实”还包含详尽之意。所谓“认定和记述史实”,是一个展示必要史料的过程,即将史实的相关材料和依据,展示给读者,让读者通过阅读史料,来认同我们的“认定”。这样的“认定”,便可能增强说服力。“用材料来说话”,也应当是《通志》的重要特点,可传达《通志》的基本风格。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在短短百年中,取得了巨大进步和超越。深入透彻全面地总结百年学科的经验,提炼百年学科的文化史、思想史含义,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真正进入一种佳境,取得意义重大的全局性突破。我们

面临的是一项真正的“世纪工程”。我们今天做的,是为今后学者的深入开拓作先期试探和铺路工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项工作一定存在欠缺和遗憾,只是希望不至于离设定的目标太远。

“通志”二字,其义也大哉!刘熙《释名》:“通,洞也,无所不贯洞也。”“志者,记载也,记录也。”《汉书》有“天文”、“地理”、“艺文”等“志”;陈寿更有《三国志》;郑樵还有《通志》一书,篇幅浩荡,内容繁富,为古代重要史学典籍之一。郑樵曰:“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通志·总序》)我们斗胆借用其书名,并非做到了“无所不贯洞”,亦无“老于典故”之自诩,只是景仰前贤,勛自嘉勉,努力来做百年学科“宪章之所系”的工作,希望能为学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文字。

徐公持 刘敬圻

凡 例

一、本书由百题构成,每题皆为学术记述之体,故称“志”。由是本书中文章,皆属学科史专题记述性质,而非论文。

二、本书百题,按专题对象区分,大凡有四种类型,即:百年学科重要事件,百年学科重要趋势,百年学科代表性研究家,百年学科代表性著作(学科经典)。

三、本书所有专题写法,要求翔实、稳妥。“翔实”指记述相关情况时,持实事求是精神,“不虚美,不隐恶”,多引用原始材料,多“用证据说话”。“稳妥”指在观点问题上取客观和宽容的态度,编写者尽量少出面议论是非;即有是非,亦应让读者在对多种材料的了解和对多种说法的比较中自行作出判断。在具体写作中,特别重视对史实的梳理和介绍,注重对原材料的发掘和展示,尽量使读者接触较多的原始材料,体察学术史上不同时期的本来状态,领会学术史的当时氛围。在叙述某文学现象的影响等内容时,也力求多引用当时或后来公开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对于发生在学术史上的争论和分歧,要介绍各方的论点,说清其来龙去脉,尽量保持“不介入”态度。但可以引述当时或以后的评论文字,来对该现象作“有控制”表态。

四、不同类型的专题又有不同要求。第一、第二种类型专题,要求介绍与对象相关的来龙去脉、存在状况、主要特点、在学科史上影响。第三种类型专题,要求重点叙述研究家的重要学术活动和贡献,在学术界的影响,兼写其简要生平。第四种类型

专题,要求重点叙述该著作以及与该著作相关的背景情况(包括学科背景和本人情况)、基本内容、主要创见、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版本变化等。

五、本书每一篇专题文章,皆分为若干小节;每节不设序号,但设小标题,以使文章纲领显豁、醒目易读。

六、本书引文,尽量引用原始材料,并细心核实无误;凡有引文,皆注明出处。

七、出处注文所包含义项,特作统一规定:凡引用书籍,注明著者、书名、页码、何地何出版社、出版年份;凡引用论文,注明作者、篇名、刊载何地何杂志、该杂志期数。

八、为便于阅读,本书注释,统一为页下注。

九、本书每篇章皆有“参考文献”,给有兴趣深入了解该专题的读者,提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信息。所收文献,包括与该专题相关的专门著作及重要文章,一般每篇“参考文献”在二十项左右,以免过于头绪繁杂不得要领。

十、本书受篇幅限制,一般每题二万字到二万五千字,视内容轻重大小,最少有一万字左右,最多不超过三万字。

十一、本书中各专题文章,因执笔者不同,自有不同的文字风格;但无论何种文风,皆力求做到学术上的谨严,表述上的通畅。

十二、本书正文中纪年,一律使用公元,不用“光绪”、“民国”等,个别行文或引文中需要出现相关字样,则标注公元纪年,以为对照。

目
录

前 言	001
凡 例	001
世纪初近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开辟之功	001
世纪初近代小说研究之发轫	036
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的滥觞	069
世纪初近代词曲研究之发轫	101
世纪初的文论研究:以章太炎为考察中心	144
世纪初传统式古典文学研究的成绩与缺欠	187
世纪初的旧红学	224
“五四”以前文化环境的近代化对古典文学学科的影响	239
进化论、性心理学等学说的传入与古典文学学科的发展	273
“纯文学”观的树立与古典文学学科性质的转变	296
“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观念与古典文学研究	332

“整理国故”对于古典文学学科在观念与方法上的意义·····	357
新红学的兴起及其成就·····	401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学的批判·····	430
“五四”时期的旧典新释(上)	
——《诗经》研究·····	465
“五四”时期的旧典新释(中)	
——楚辞研究、陶渊明研究·····	487
“五四”时期的旧典新释(下)	
——新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研究·····	521
“五四”后古典文学学科中的女性视角·····	543
“五四”前后的俗文学研究(上)	
——“五四”前后(1918—1937)俗文学运动的历史轨迹 ·····	576
“五四”前后的俗文学研究(中)	
——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	603
“五四”前后的俗文学研究(下)	
——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	639
参考文献·····	677

世纪初近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开辟之功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戊戌变法(1898 年)后至五四运动(1919 年)前后,是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上一个独特时期。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国内社会的变革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都使文学批评面临着新境遇,肩负起新使命。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的确发挥了除旧布新、继往开来的承传作用,开辟之功不可埋没。

文学观念根本转变的起点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将文章看做“经国之大业”,将“立言”看做人生之不朽盛事,说文以载道、劝善惩恶,可以说看到并且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但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这种价值在更大程度上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而这种观念的打破,必须以国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这只有到了近代,当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输入中国、当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苦苦寻求出路时,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因此在回顾文学观念变化时,也一并梳理一下对西方思想的接受情况。

一、西学的引进与接受

中国近代文学家与思想家一个共同特征是对西方思想的接受,虽然程度不同,角度不一,但以西方思想武装自己来唤醒民

众救亡图存却殊途同归。他们或翻译西方思想文化著作,或撰文著书介绍西方文化思想,为“睁眼看世界”的国人打开一个窗口。

1842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以《四洲志》、《康輶纪行》为基础编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是,魏源对师法西方只是局限于坚船利炮等军事科技方面,对西方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等的接受与宣传则有待于后来之人。

1848年,徐继畲编著《瀛环志略》十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各卷篇首还附有粗略的地图。1890年,梁启超进京赴试,落第而归,取道上海,便买下了这部著作。它打开了梁启超的眼界,使他知道世界上除中国以外,还有五大洲的诸多国家,每个国家又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文明。后来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曾将《瀛环志略》和《万国史记》一起推荐给学生,促其了解世界历史与世界形势。

1898年,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此书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发展规律,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使国人树立了竞争意识,也为变法图强推进社会进步找到了理论根据。

除翻译以外,严复还著文介绍卢梭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并运用其“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等批评中国旧的伦理道德,宣传自由和平等等全新的伦理观念。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刊印了《民约论》,改名为《民约通义》。《民约论》作为卢梭的代表作,曾经在理论上指导过欧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此时,中国知识分子亦由它而受到巨大震动。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思想的推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有为非常重视西学,在万木草堂,他曾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西学著作,甚至说:“若将制造局书全购尤佳,学至此,则圣

道王制，中外古今，天文地理皆已通矣。”他本人的著作虽然更多地从儒家传统经典中寻求积极意义，但也借鉴吸收了某些西方观点。这从他的《大同书》可见一斑。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其自身所创作，则《大同书》也。初，有为既从学于朱次琦毕业，退而独居西樵山者两年，专为深沉之思，穷极天人之故，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①

梁启超将《大同书》的内容类比为民治主义、联合主义、儿童公育主义、老病保险主义，实与西方人文思想有相通之处。

梁启超在康有为影响下，亦致力于西学的研习与宣传。1895年6月，协助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8月，成立强学会（又称译书局、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将《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会刊，梁启超与汪大燮同为主笔。强学会开局后，先以翻译各国日报为主，如伦敦《泰晤士报》、《代谟斯报》，日出一张，拟待西书购到，即译书，但强学会不久被封禁。

1896年7月，黄遵宪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梁启超为主笔。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余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

1897年秋冬间，梁启超与友人在上海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并制定如下宗旨：“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或编为丛刻，以便购读；或分卷单行，以广流传。”

戊戌年（1898年）十一月十一日，《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刊,至辛丑年(1901年)十一月,共出100期。梁启超在此发表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的文章先后有《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等。

此外,梁启超介绍西方哲学家的文章还有:《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介绍培根与笛卡儿;《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康德哲学思想的文章;《论希腊古代学术》,则介绍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主要流派。

1902年,《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每月1日、15日发行。梁启超在该报章程(《新民丛报》第一号)中说: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

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梁启超为该报主笔,甚至日写五千言。第一年见报的文章有《新民说》、《新民议》两篇。《新民说》里有《论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等十余章。

另外,早期的王国维也十分重视西学的价值,并为西方哲学思想的输入做了大量工作。他在1898年3月1日致许同兰的信中说:

蒋伯斧先生说:西人已与日本立约,二年后日本不准再译西书。然日本通西文者多,不译西书也无妨。此事恐未

必确，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①

1902年，26岁的王国维离海宁经上海去日本留学。在藤田丰八的介绍下入东京物理学校学习。

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而后，遂为独学之时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②

此后王国维先后翻译日本文学博士桑木严翼著《哲学概论》、日本文学博士元良勇次郎著《心理学》，二书均作为《哲学丛书》初集由《教育世界》杂志出版。又译《哲学小辞典》，刊《教育丛书》二集。

1903年，王国维已遍读西方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方面著作。他在《自序一》中说：

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

1903年11月，王国维译英国西额惟克著《西洋伦理学史要》，刊入《教育世界》杂志第五十九号至六十一号。此外，撰《哲学辨惑》，收入《教育丛书》三集。

1904年，王国维研读的是叔本华与康德。7月，写成《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11月，写成《叔本华与尼采》。

1905年3月，撰《论近年之学术界》，论及西洋思想输入中国时所受阻力，以及与中国思想“相化”等问题。9月，将几年来刊于《教育世界》的12篇文章并所作古今体诗50首，重加刊行，名为《静庵文集》。

①《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②王国维：《自序一》，见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40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